

# 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 應對中蘇共同干預

• 沈志華

**摘要：**1956年朝鮮勞動黨「八月全會」，特別是對發表不同意見的反對派幹部的處理，引起中共和蘇共的強烈不滿。經過商議，中蘇決定共同進行干預，並派米高揚和彭德懷趕赴平壤，要求再次召開中央全會，作出新的決議。金日成被迫承認錯誤，並答應按照中蘇兩黨的意見行事，但實際上陽奉陰違，拖延不辦。10月，「波匈事件」爆發，金日成趁中蘇注意力轉向歐洲之際，再次實行內部整肅，並提出要請聯合國幫助處理朝鮮問題。毛澤東大為震怒，認為朝鮮將脫離社會主義陣營，從而與蘇聯商議要對金日成採取強硬措施，並期望蘇聯幫助中共解決朝鮮問題。

**關鍵詞：**朝鮮勞動黨 金日成 「八月事件」 「九月全會」 中朝關係

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蘇共二十大），提出了一整套「新方針」，對外政策以「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為綱領，開始推行緩和與西方關係的路線；對內政策強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改善經濟管理體制，其許多具體措施為以後可能進行的經濟改革提供了思想準備和政策準備。在這兩個方面，蘇共的方針與正在思考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中共不謀而合。關於這一點，只要把蘇共二十大與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八大）的文件稍作比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sup>①</sup>。對於赫魯曉夫（Н. С. Хрущев）在2月25日所作的以批判個人崇拜為主題的「秘密報告」，毛澤東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蘇聯人自己出面，搬掉了多年壓在中共頭上的一塊大石頭，以後不必再對莫斯科俯首聽命，自然可喜可賀；而「非斯大林化」打破了共產黨長期建構的領袖神話，引發社會主義世界的思想混亂，則是令人擔憂的。儘管毛本人對批判個人崇拜不以為然，但當時大勢所趨，也不便表露出來。

總體而言，對於蘇聯、中國和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來說，1956年都是其發展道路上的一個十字路口。在一曲政治雙重奏中，蘇共與中共同時開始考慮

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問題。中共八大與蘇共二十大不僅在時間上是銜接的，在思想認識、方針政策以及發展路線等各方面，也都是一致的、相通的。特別是中共中央及時發表在《人民日報》的理論性文章，把個人崇拜現象歸結為思想方法問題，並提出對斯大林的功過應該三七開評價<sup>②</sup>，為各國共產黨所接受，幫助蘇聯穩定了局面。即使在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上有一些分歧，但蘇共很快就跟上了中共的步伐。所以，與很多學者的傳統看法不同，此期的中蘇關係不是消弱了，而是加強了。更重要的是，蘇共二十大造成的結果之一就是提高了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和影響——以前是蘇共領導中共，並在經濟上援助中國，現在中共開始在政治上幫助蘇共了。中蘇兩黨平起平坐，共同領導社會主義陣營的趨向，在緊接着處理朝鮮勞動黨（以下簡稱勞動黨）「八月事件」的過程中便明顯地表現出來<sup>③</sup>。本文依據俄國最新的解密檔案，講述1956年9月中蘇兩黨協商處理朝鮮問題的過程及結果、金日成對此採取的應對方略，以及毛澤東在「波匈事件」以後對朝鮮問題的進一步思考。

## 一 中蘇兩黨決定派代表團去平壤

1956年勞動黨中央「八月全會」閉幕以後，朝鮮立即籠罩在一片「殺氣騰騰」的陰影當中<sup>④</sup>。9月5日，《勞動新聞》刊登了中央全會〈關於崔昌益、尹公欽、徐輝、李弼奎、朴昌玉等的宗派陰謀〉的決議，並宣布撤銷崔昌益、朴昌玉和尹公欽在政府中的任職<sup>⑤</sup>。黨內的政治清洗隨即展開，報紙上開始出現對「我們中間的敵人」、「分裂份子」、「宗派份子」、「反黨份子」進行揭露和批判的消息<sup>⑥</sup>。

朴昌玉在解除職務後，被下放到東海岸的一個木材加工廠；崔昌益則被安排去了一個養豬場。檢察機關開始大力搜集崔昌益、李弼奎、李相朝等人的罪證材料；所有反對派幹部都被取消了幹部配備的物品供給和醫療服務，他們的家屬也受到警察的嚴密監視。勞動黨平壤市委兩位副委員長和組織部長被解除職務，民族保衛省副相金元松、軍事科學院副院長李雲奎、海軍政治部副主任李英浩都因「反黨集團」事件遭到查辦。已被派往蘇聯學習的建設相金承化也因與「反黨集團」領導人朴昌玉和崔昌益有頻繁接觸而受到追查，遞信省（副）相金昌欽則被作為「同情者」牽連進來。朝鮮政府還下令召回駐蘇大使李相朝，罪名是與英國諜報機構有聯繫<sup>⑦</sup>。不僅黨政機關，在大學裏也開始再次掀起大規模的思想檢查運動，金日成大學黨委員長洪洛雄被迫出逃中國，不少教授、學者被秘密警察帶走，一去不回<sup>⑧</sup>。

中國領導人是最早獲悉朝鮮「八月事件」詳細內情的。據逃亡中國的原朝鮮內閣文化省副相金剛對筆者說，他與貿易相尹公欽、徐輝、李弼奎於8月30日晚駕車離開平壤，一路很順利，第二天在安東過邊界時受到盤問，他們直接說出了自己的身份。驚愕不已的中國邊防哨所立即與上級取得聯繫，並按照指示直接把他們送到了北京。周恩來總理和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第一時間接見了尹公欽等人，聽取了他們的報告。隨後，中共中央按省部級待遇把逃亡者安排在一棟日本式別墅住下，並要他們寫出詳細的文字資料<sup>⑨</sup>。

9月4日，中國駐朝大使喬曉光邀蘇聯大使伊萬諾夫(В. И. Иванов)見面，向他通報說，朝鮮副外相李東根9月3日告知，尹公欽等四名公民在安東地區越過朝鮮邊境，被中國邊防軍截獲，朝鮮政府請求中國政府將上述四人遣返回朝鮮。喬答應立即上報中國政府，又說中國邊防部隊也建議將他們遣返，但這些人堅決表示拒絕返回朝鮮。接着，喬告訴了伊萬諾夫中國政府對朝鮮政府的答覆：「上述人等並非普通越境者，強制性將他們遣返回國是不可能的。」隨後，雙方互相詢問對此事的看法，但都避免做出正面回答<sup>⑩</sup>。儘管如此，中國政府對遣返問題的正式答覆表明，似乎中國領導人已經改變了對朝鮮百般寬容和忍讓的態度。據蘇聯外交部的觀察，自南北朝鮮停戰以來中朝關係有些「不正常」，朝鮮政府對在朝鮮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很冷淡，而中國則「對朝鮮人表現得很克制」<sup>⑪</sup>。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所的統計數字也很能說明問題：1954年11月至1956年7月，朝鮮政府派出訪華代表團四次，最高級別為副部長級；中國方面，僅1955年8月至1956年6月，政府代表團訪朝就有五次，最高級別為國家副主席<sup>⑫</sup>。1955年3至4月，新上任的志願軍司令員楊勇和政委李志民極力表現出對朝鮮的尊重和熱情，他們到朝鮮後第一件事就是拜訪金日成，並多次主動向金報告和請示<sup>⑬</sup>。為了加強中朝友誼，國務院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在8至12月專門組織了一次對援助朝鮮(及越南)工作的全面檢查，由國家建設委員會主任薄一波親自負責。國務院下文要求有關部門努力克服工作中的缺點，「該賠的賠，該補的補，該換的換，該重修的重修」，並嚴厲追究責任<sup>⑭</sup>。中國對朝鮮的大規模經濟援助和改善中朝關係的百般努力，換來的卻是「延安派」幹部的被迫逃亡和朝鮮政府的遣返要求，毛澤東焉能不惱火？同時，勞動黨的政治狀況也讓中國領導人憂心忡忡。

9月5日，徐輝、尹公欽、李弼奎和金剛向中共中央遞交了一份長達二十頁(俄文打字)的信件，詳細講述了在朝鮮發生的事情以及他們的看法。徐輝等人首先表達了他們對勞動黨現狀的基本看法：金日成將黨、政府、軍隊、司法大權集於一身，蔑視黨內民主，壓制不同意見，建立了凌駕於黨、國家和人民之上的絕對獨裁統治。勞動黨的嚴重錯誤在於：一、錯誤地估計形勢而發動了戰爭；戰爭中出現種種誤判；極端左傾的方針使黨嚴重脫離人民；二、黨內缺乏民主生活；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至上；幹部任用以派劃線，任人唯親；工作中官僚主義十分嚴重；黨內濫施懲罰，已有十二萬人被開除出黨；黨內關係受到破壞，缺乏真正的團結；三、宗派主義嚴重，與民主黨派關係緊張；無視工農聯盟，對農民實行剝奪；對城市小資產階級進行掠奪，課以重稅；粗暴地破壞法制，濫殺無辜，共和國十分之一的公民遭到過監禁；無視人民生活；四、宣傳工作完全圍繞着對金日成的歌功頌德展開；捏造歷史，散布謊言，神化金日成；突出所謂「民族精神」，很少宣傳蘇聯、中國和兄弟國家的幫助。在詳細講述了從勞動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勞動黨三大)到中央「八月全會」他們經歷的事情以後，徐輝等人得出結論說，金日成已經「開始背叛革命」，「金日成的存在已經成為朝鮮革命道路上的阻礙，只有排除金日成，朝鮮的革命才能快速發展並促進祖國的統一和社會主義建設」<sup>⑮</sup>。

差不多與此同時，蘇聯領導人也得到了關於「八月事件」真實情況的報告。9月3日，李相朝給赫魯曉夫寫了一封信，反映了8月30日會議的情況，

並建議：為了更深刻、更全面地幫助朝鮮黨制訂措施，糾正錯誤，希望蘇共中央派負責幹部去朝鮮，召集勞動黨所有中央委員（包括被開除者）開會；或者邀請勞動黨中央代表和被開除的同志到莫斯科，與蘇共中央主席團一起開會；或者以蘇共中央的名義（如果聯合中共中央更好）向勞動黨中央發出講述實質問題的呼籲書<sup>⑩</sup>。9月5日，蘇聯副外長費德林（Н. Т. Федоренко）向中央遞交了李相朝的信，並報告說，在會談中，李反映了目前勞動黨內出現的鎮壓和恐怖的情況，如中央候補常委、副首相朴義琬（蘇籍朝鮮人）就受到威脅，不得再發表批評意見。李還說，他已經兩次被召回國，但他藉口有病推脫了，並表示如果中國同意，他想去中國。最後，他表示希望盡快知道蘇共中央的態度<sup>⑪</sup>。

9月6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召開會議並做出決議：一、對發生在勞動黨中央全會的事件應予以認真重視，蘇共中央認為有必要與勞動黨領導人以及中共就此事交換意見；二、委託出席中共八大的蘇共代表團與勞動黨和中共領導人聯繫，以交換對勞動黨形勢的看法；三、委託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М. А. Сулов）和波諾馬廖夫（Б. Н. Пономарев），在三天內準備並交付關於朝鮮問題給中共中央的聲明草案<sup>⑫</sup>。根據會議記錄，蘇共中央還委託波諾馬廖夫接見李相朝，並通知中國駐蘇大使，蘇共代表團將與中共中央交換意見<sup>⑬</sup>。

9月10日，波諾馬廖夫與李相朝舉行會談。李相朝說，他給毛澤東的信已經發出，並希望聽取蘇共中央對朝鮮問題的意見。李被告知，中共中央已通知蘇聯有四位朝鮮領導幹部逃到中國，蘇聯駐平壤大使也有報告，蘇聯領導人對此「高度重視」，「對所發生的一切事件感到憂慮」。根據委託，參加中共八大的蘇共代表團正在分別與朝鮮代表團及中國同志商談勞動黨的內部情況。關於蘇共的立場，波諾馬廖夫指出，向朝鮮方面提出建議和意見原則上是可以，但「朝鮮勞動黨是一個獨立的政黨，各兄弟共產黨不可能干預其內部事務」，「應當理解蘇共和中共方面在採取一定步驟和舉措向朝鮮勞動黨提出建議問題上所存在的各種複雜情況」。對於李相朝提出最好能在報刊上發表一些即便是以普通方式表述的批評性意見的要求，蘇聯的答覆是，目前不應討論這個問題<sup>⑭</sup>。或者當時蘇聯還未確定處理朝鮮問題的具體方針，又或者不願意對李相朝做詳細說明，但事情最後的處理還是採取了李建議的三種方式之一。

9月14日，米高揚（А. И. Микоян）率團抵達北京，準備出席中共八大。在當天的禮節性會見中，毛澤東與米高揚簡單地談到了朝鮮問題。米高揚提到，受蘇共中央委託，他將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勞動黨內的局勢問題進行會談。毛對此感到興奮，並通報說，從朝鮮逃亡中國的同志寫了一些材料，看來朝鮮黨內的情況非常糟糕。毛說，我們勸說他們回去，但他們堅決拒絕，因為金日成會迫害持有不同意見者，例如他拒絕中共的勸告而槍斃了朴憲永。米高揚通報說，金日成到莫斯科的時候，蘇共中央曾向他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議，希望他採取列寧主義的黨內生活準則，改善黨的領導制度<sup>⑮</sup>。

9月15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批准了關於勞動黨問題給蘇共出席中共八大代表團的指示<sup>⑯</sup>。不過，這一指示的內容目前尚未解密，研究者只能從後面的幾次會談記錄中尋找蘇共中央決策的蛛絲馬迹。9月16日，米高揚根據蘇共中央的指示與崔庸健及朝鮮代表團成員舉行了會談。米高揚首先提出，從中國

同志那裏得到消息，有朝鮮幹部跑到了中國，但金日成在關於「八月全會」的通報中沒有說這個情況。崔回答，朝鮮方面正要通報此事，而且也請求與中國同志會面，惟尚未得到答覆。隨後，崔等人簡單講了勞動黨中央全會的情況，會談便結束了<sup>③</sup>。9月17日，米高揚給蘇共中央的報告說，會談是蘇方主動提出的，朝鮮方面似乎並沒有準備，所談內容也很簡單，只是對他們的做法進行辯解。米高揚說，我們無法完成中央的委託，即把金日成和其他中央常委委員叫到北京舉行會談，因為「金日成根本就沒有打算來」。要討論朝鮮問題，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與中共中央的代表一起去平壤。他表示：「如果中央沒有其他指示，我們就這麼辦了。」<sup>④</sup>

9月18日晚6時至10時，蘇聯代表團與毛澤東、彭德懷等中共領導人舉行了會談。根據蘇方的記錄，米高揚首先指出，勞動黨「出現了不健康的情況」，他們「違反了列寧的黨內生活準則」。儘管蘇聯領導人曾在莫斯科提出了建議，金日成也承諾加以糾正，但卻反其道而行之，在中央全會上把一些對黨提出批評意見的中央委員開除了黨籍。毛也談了中方掌握的情況，並說朝鮮黨早就逮捕的朴一禹是一位優秀的共產黨員。雙方互通情況後，米高揚提出，「我們兩黨必須幫助朝鮮勞動黨領導人糾正錯誤」，並說「我們相信金日成」，但無法容忍他的做法，建議蘇共和中共組成聯合代表團赴朝鮮。毛表示同意，又說：「金日成對我們黨有敵對情緒」，「必須讓金日成明白，如果不糾正錯誤，他終究無法鞏固自己的領袖地位」。毛補充說：「我們必須對金日成方面的極端舉措有所準備，他甚至可能提出讓中國志願軍撤出朝鮮的問題。中國軍隊當然希望回到祖國，可我們知道，美國人正在南朝鮮不斷加強自己的力量，我們認為，仍有讓中國志願軍留在朝鮮的必要。」毛還建議，蘇中代表團在平壤期間，最好與勞動黨達成一個文字協議，而且必須在報刊上發表；應該讓蘇聯和中國駐朝鮮大使也參加代表團，以便代表團走後仍能對朝鮮執行協議的情況進行監督。會談中，中方還提出讓逃亡的朝鮮幹部返回平壤並恢復其在黨內的地位，並打算提出朴憲永的問題。蘇方同意中共的主張，只是認為朴憲永的問題不宜再提。會談最後達成一致意見，先讓崔庸健通報情況，然後蘇中代表團與他一起去朝鮮。米高揚在報告中說，從中國同志的談話可以看出，他們已得到關於勞動黨內部情況的詳細通報，並對金日成持批評態度。「對中國同志而言，與朝鮮勞動黨的關係問題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sup>⑤</sup>。從毛提出的要求看，中朝之間缺乏最基本的信任，這為後來雙邊關係出現的危機埋下了伏筆。

中方的會談記錄與上述大體相同，只是更為詳細。會談中，彭德懷還提出了「延安派」幹部方虎山的問題，就因為他提出發動戰爭的時機不對便被撤職了。毛澤東說，金日成在蘇共二十大以後「還在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對的話都聽不進去，誰反對，就殺誰」。談到對朝鮮問題的處理，毛說，我們要勸金改正錯誤，也要勸那些被整的人採取和解態度。談到匈牙利情況時，米高揚說，蘇共二十大以後，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總書記拉科西（Mátyás Rákosi）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對，後來他親自去布達佩斯處理了這件事。在蘇聯的勸說下，拉科西被迫辭職。毛說，「拉科西同志是個好人，馬列主義水平高。拉科西同志可以退，但金日成就很難辦」。毛還對米高揚說，這次主要靠

你們了，他們不聽中國人的話。米高揚說，「他們聽是聽，可做的是另一套」。毛又說，「他是怕我們兩個黨挖他的牆角」，「老實講，不改，不挖也會倒」。雙方最後商定，會談後先由中國黨找崔庸健談話，然後蘇聯黨再找他談，第二天一早三方一同去平壤<sup>26</sup>。

9月18日晚10時半至12時，毛澤東接見了朝鮮代表團一行。毛開門見山地對勞動黨的一系列錯誤做法進行了批評，並以命令的口吻告知，明早7時蘇共代表團和中共代表團要去平壤，崔庸健也一起回去，留下一個人繼續參加中共八大。毛明確講：「我們是要幫助你們解決問題而不是要破壞你們。」他過去對朝鮮的一些做法也有意見，但是沒有像現在這樣提出批評。關於朝鮮戰爭，毛也提醒過金日成，「這個戰爭不應該打」。彭德懷和李克農甚至直接質問：「朝鮮戰爭究竟是誰發動的？是美帝國主義發動的還是你們發動的？」朝鮮代表團成員李周淵驚愕地說：「我真不明白為甚麼問起這個問題來。」毛回應說，戰爭給朝鮮人民帶來那麼嚴重的災難和痛苦，「這是非常慘痛的教訓」；又說蘇聯、中國、朝鮮之間的關係太密切了，「你們國內發生問題，也影響到中國和蘇聯。因此，對你們這些問題我們不能不干涉」。崔庸健、李周淵做了一些辯解後，毛嚴厲地說：「你們就是這樣把黨內問題和反革命問題連在一起，給自己的同志扣上『反革命』、『叛徒』等帽子，逮捕他，殺掉他，這是嚴重的錯誤。」彭德懷補充道，「這是路線上的錯誤」。毛接着說，「你們黨內充滿了恐怖的情緒」，「應該同那些有反對意見的同志講和」，恢復他們的黨籍和原有職位。對跑到中國來的同志，也「要恢復他們黨內和黨外的職務，把所有問題拿到黨的會議上來冷靜地討論解決」。崔最後只無奈地說了一句：「談的都對，我們不能不接受。」<sup>27</sup>

9月19日早晨7時，米高揚、彭德懷、崔庸健一行飛往平壤<sup>28</sup>。

在以往的研究中，由於尚未看到檔案文獻，有學者根據個別當事人的回憶史料傾向於這樣一種看法，即中蘇決定共同派代表團去平壤，其目的不僅要制止金日成進一步實行政治清洗，更可能是為了找一個能夠被接受的人取代金，而且，最初的動議來自中方。至少，中蘇雙方討論了這個問題<sup>29</sup>。現在有關中蘇兩國領導人討論朝鮮問題的雙邊檔案均已披露出來，根據上述文件可以斷定，無論是蘇共還是中共，此時並沒有任何要替換朝鮮領導人的意圖。他們在會談中幾次談到，對金日成還是要支持，要幫助他改正錯誤，目的是穩定朝鮮局勢。儘管中國領導人的講話措辭嚴厲一些，可以看出他們的確對朝鮮領導人感到不滿和氣憤，但同樣可以看出，毛澤東的主要目的是改善中朝關係。他所表達的意思是，只要金日成能夠接受批評，認識和改正錯誤，沒有人要推倒他。

## 二 金日成被迫重新召開中央全會

1956年9月19日米高揚、彭德懷和崔庸健抵達平壤，金日成沒有如通常那樣出面迎接這些不請自來的兄弟黨「客人」<sup>30</sup>。不過，米高揚和彭德懷一到

平壤便與金日成進行了四個小時的單獨談話（南日擔任俄語翻譯，師哲擔任中文翻譯）。米高揚和彭德懷事先商定，這次會談的任務就是要說服金日成，讓他明白，中蘇兩黨的共同目標很明確：「不是削弱而是鞏固金日成同志本人目前在朝鮮勞動黨的領導地位。」中蘇領導人對金日成都非常了解，也給予高度評價，但無法贊同他在朝鮮所採用的領導方式。「我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建議幫助朝鮮領導人，希望他對那些在某些政策問題上持不同見解的中央委員不是採取鎮壓方式，而是採取黨內民主方式，以獲得群眾對黨的領導的信任和領導人之間的團結一致」。為此，在徵得朝方同意的情況下，「建議召集中央全會，以便在會上糾正上次全會的錯誤」，取消勞動黨中央「八月全會」所做出的將一批中央委員開除出黨的錯誤決定，同時批評勞動黨錯誤的領導方法。經過長時間的討論，金日成和南日表示，原則上接受中蘇的意見，但是否所有中央委員都同意撤銷中央全會的決議，還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金說，他同意撤銷將一些中央委員開除出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但不包括已經逃往中國的四人；可以恢復他們的黨籍，但不能讓他們繼續留在勞動黨中央。對此，米高揚和彭德懷表示同意。金還提出，朴昌玉內閣副首相的職務不能恢復，崔昌益也不能繼續擔任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對此，米高揚和彭德懷認為需要再研究這樣做的利弊。至於甚麼時候召集中中央全會，金說需要召集中央常委會討論。9月20日，朝方通知，當晚召開中央常委會。米高揚報告說，各種迹象表明，在此之前，勞動黨決定先召開一次沒有中蘇代表參加的單獨會議<sup>⑤</sup>。

9月20日晚，蘇中代表團出席了勞動黨中央常委會會議。金日成首先發言，說明了代表團的來意，並表示「我個人很願意接受兄弟黨代表團提出的所有建議」，但又強調說，勞動黨對崔昌益等人做出組織處理，是因為他們從事了反黨活動。在中央「八月全會」前，常委會一直對他們採取了容忍態度和予以教育，並沒有對他們做組織結論，但他們在中央全會的發言激怒了中央委員，出於憤怒的情緒，中央做出了將他們開除出黨的決定。現在看來，「我們被一時的激憤所左右，做事過於情緒化」。「鑒於兄弟黨的建議和目前的局面」，建議本次會議重新審議「八月全會」的決議，對於犯了錯誤的同志要有「寬闊的胸懷」，採取「寬容的態度」。金也說到，應利用這次教訓，檢查過去的工作，團結黨的隊伍。金請各位常委發表意見，但幾分鐘過去了，仍沒有人說話。米高揚點名要南日表態，南日只說了一句：同意金日成的意見。這時金再次發言說，必須認識到那些被開除的人是犯有錯誤的，但「我們應表現得寬宏大量」。接着，崔庸健、南日和金昌滿發言，按照金日成定的調子，表示同意兄弟黨的建議，但主要話題還是批判那些被開除出黨的人所犯的錯誤。金昌滿甚至把崔昌益等人的活動與保加利亞和匈牙利更換領導人的情況作比較，以至米高揚不得不作出糾正。米高揚說，朝鮮的情況與東歐不同，絕不能認為是蘇共二十大導致了各國共產黨領導層出現危機。隨後，朴義琬的發言着重談了「八月全會」決議的錯誤。他指出，尹公欽在全會的發言雖然激烈而尖銳，但並沒有讓他把話說完，其他逃亡中國的人根本就沒有發言。他們是受到攻擊，擔心被逮捕才逃亡的。全會在不知道他們要講甚麼的情況下便將他們開除出黨，這是不對的。至於朴昌玉，並沒有獲安排在全會上發

言，他只是在受到質問時才起來講話，為自己辯解，結果也被開除了。現在的根本問題是，誰提出不同意見，就被看成是反黨。在這次會議上，不是要追究那些被開除的同志的錯誤，而是要做出判斷：中央全會的決議是否正確，如果不正確就應該撤銷。在朴金喆繼續為「八月全會」的決議做了幾句辯解後，米高揚發表了長篇講話。他首先再次表明來到平壤的目的，就是履行國際主義義務，消除勞動黨已經出現的「危機徵兆」，穩定社會主義陣營的「前沿陣地」。在批評了勞動黨的錯誤後，他進一步指出，金昌滿在發言中認定被開除的中央委員的活動具有反黨性質，其證據「完全都是錯的」。任何人如果想表明自己的觀點，就是反黨，就是宗派主義，這種情況很不正常。他說：「你們擁有巨大的權力」，可以把反對者「開除出黨、逮捕，甚至槍決」，然而，在中央全會發表自己的意見是「每一位黨員無可爭議的權力」！米高揚再次表明，蘇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都相信並支持金日成的領導，但其領導方式必須改變。勞動黨需要在近期召開中央全會，糾正「八月全會」的錯誤，通過一個決議，即使不長，但也要在報刊上發表。彭德懷隨後發言，主要講述了中共如何對待犯有錯誤的同志的歷史。他指出，「八月全會」決議的錯誤絕不只是過於草率，其實質問題在於勞動黨中央害怕批評，違反黨章處分具有不同意見的同志。彭最後指出，「中共中央認為，如今沒有人可替代金日成同志，也沒有人願意這樣做」。崔庸健再次發言，提出在即將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應該首先指出那些被開除者的反黨錯誤，然後為了黨的團結，準備做出更加寬容的決議。這時金日成接過來說，不應與「八月全會」聯繫在一起，以免引起爭議。但如果還有他們反黨活動的材料，就可以說得更詳細一些。又說：「中央全會必須糾正對那些被開除者所做的錯誤決議」，在全會召開前，常委應該在黨內做一些解釋工作。會議最終通過了決議，決定兩天後召開中央全會。會前中央常委會將起草決議，報請全會審議，全會決議應在報紙上公布<sup>②</sup>。

從上述發言內容看，除朴義琬外，金日成及多數朝鮮領導人雖然表示同意蘇中代表團的意見，撤銷「八月全會」的決議，但發言中強調的都是被開除黨籍的人犯有反黨的嚴重錯誤，對他們做出的組織處理只是急躁和草率了一些而已。應該指出，這裏的邏輯是不成立的，如果這些人反黨，開除他們就是正確的，如果全會決議是錯誤的，這些人就沒有反黨。很明顯，金日成內心並不同意也不情願承認錯誤，只是受到蘇聯和中國的壓力，被迫和勉強地接受了他們的建議。米高揚、彭德懷以及朴義琬的發言都明確地指出，這些被開除的人並沒有反黨，對他們做出組織處理的決議是錯誤的，所以需要再次召開中央全會，重新審議。但奇怪的是，米高揚在給蘇共中央的報告中並沒有突出地說明這一點，只是說：「總體而言，金日成的發言還不錯」，所有發言者都同意他的建議，即再次召集中央全會，重新審議上次全會的決議。中央常委會決定，9月22日晚或23日晨召集全會，全會決議由常委會起草，然後蘇中代表團參與協商。儘管米高揚的報告中也指出，朴義琬不同意把「八月全會」的錯誤僅僅歸結為「過於倉促」，而強調勞動黨採取了「壓制和恐嚇的方式」，但整個報告對此輕描淡寫，彷彿這次常委會開得很順利，沒有甚麼問題<sup>③</sup>。箇中原因，尚難確定。不過，聯繫後來米高揚的態度，很可能是由於他希望盡快完成這次任務，而不願節外生枝。

9月22日，蘇中代表團與金日成、金科奉、崔庸健、南日和金昌滿討論了朝鮮人起草的決議草案。米高揚和彭德懷認為，決議草案基本可以接受，但應該刪除草案中關於「八月全會在挽救犯錯誤同志方面未表現出足夠的耐心」一句中的「挽救」一詞，還需要補充如下內容：必須實行黨內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耐心對待犯了錯誤的同志。米高揚又提出，常委會還應起草一份關於被撤銷政府職務的相關領導幹部恢復或重新安排工作的決定。金日成等人均表示同意。彭德懷還提出，有必要重新審議「八月全會」以前對一些幹部所作的懲罰性決議（很可能是暗示朴一禹等人的問題）。金科奉和金日成提出，還有一些中央委員對新的決議有不同意見，需要進一步做解釋工作。會議決定，全會開幕的時間定在23日早上。米高揚報告說，如果全會順利結束，他們將於當天返回北京<sup>④</sup>。

9月22日晚，應金日成的要求，蘇聯代表團與金日成、南日進行了單獨會面，會談從9時持續到深夜2時。在討論了一些經濟問題後，金拿出了經過修改的決議草案。米高揚再次表示蘇共和中共都是支持金日成的，只要他主動進行自我批評，確保改正錯誤。在這個小範圍的會談中，金全面地、誠懇地向蘇聯人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並保證「將盡全力糾正所犯錯誤，確保在黨內實行列寧的黨內生活準則和在朝鮮勞動黨所有活動中的集體領導原則」。米高揚希望金在第二天召開的全會上「把這些話都講出來」，金保證會這樣做，並信誓旦旦地表示，「蘇共中央的所有建議他都將奉為工作指南，蘇共在他心目中擁有不容置疑的權威」；「朝鮮勞動黨絕不會再重犯近期所犯的錯誤」。最後，米高揚提出希望盡快釋放朴一禹，金答應很快就會辦好<sup>⑤</sup>。金明顯地是在討好米高揚，以此表明他在中蘇之間更信賴和依靠莫斯科。這與後來米高揚對金處處維護的態度，也許不無關係。

9月23日，勞動黨中央全會開幕。金日成首先發言，承認「八月全會」在處分崔昌益等人的問題上做得「過於簡單，有些倉促」，那些逃往中國的人並沒有「為敵人工作」。金宣布了中央常委會的決定，恢復崔昌益和朴昌玉中央委員的資格，恢復尹公欽、徐輝和李弼奎的黨籍，並表示希望他們回到朝鮮來。金呼籲全黨團結起來，落實民主集中制，採取更加謹慎和耐心的態度教育犯了錯誤的同志。然而，在接下來的一系列發言中，勞動黨中央組織部部長韓相斗、咸鏡南道委員長玄正民、平安北道人民委員會委員長韓泰全、科學院通訊院士李清源、咸鏡南道人民委員會委員長李維民、勞動黨平壤市委員長李松雲、勞動黨開城市委員長李昌鈺等人，就像事先經過排練一樣，全部講話內容都是集中批判崔昌益、朴昌玉、尹公欽、徐輝、李弼奎，說他們打着批判個人崇拜的幌子反對黨，密謀分裂黨，是「老牌宗派主義者」，「與李承晚一唱一和」，而且生活腐化、強姦婦女、揮霍浪費，但最後卻異口同聲地表示贊同中央決定，為這些人恢復黨籍。金日成和朴正愛雖然偶爾插一句話，請他們言歸正傳，但並沒有打斷發言。只有勞動黨農業部部長朴勛一（原「延安派」幹部）的發言，直言不諱地批評「八月全會」的做法，並點名指責朴金喆、金昌滿、韓相斗，甚至指出「國家領導人也有不當之處」。朴勛一還以自己的遭遇為例指出，「八月全會」以後黨內形勢非常緊張，一些黨員幹部受到訊問、追查和指控。金日成提醒他不要太激動，他卻提出了更加尖銳的問

題：建議解除朴金喆、金昌滿和韓相斗在黨內的職務，因為他們在黨的幹部中製造了仇恨氛圍。這時會議主持者朴正愛建議停止大會辯論，而會場上立即有人要求把朴勛一列入宗派主義集團，並要求大會討論朴勛一的問題。金日成站出來說，朴勛一的問題以後個別談，緊接着就致閉幕詞。隨後，由金昌滿宣讀了決議草案，大會一致通過。中央全會就此結束<sup>⑳</sup>。

中央全會決議關於修改對崔昌益等人黨內處分決定的解釋是：

毫無疑問，上述同志犯下了嚴重錯誤。然而，本次全會認為，八月全會在研究與這些同志相關問題的過程中也缺乏必要的謹慎，解決問題的態度有些簡單。總之，在以教育方式幫助這些同志改正錯誤方面未表現出足夠的耐心。從真誠希望進一步鞏固黨內思想統一和必須集中我黨全部力量以實現當前緊迫革命任務的角度出發，本次全會認為，儘管這些同志所犯錯誤極其嚴重，我們還是要對他們表現出寬容，為他們提供重新思考和清除所犯錯誤的機會。

決議要求「各級黨組織均應堅定不移地開展如下方面的鬥爭：進一步擴大和發揚黨內民主、加強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批評。所有黨組織都應更大程度地加強團結和黨的戰鬥力，全面提高廣大黨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sup>㉑</sup>。

關於這次平壤之行，有一位參加了代表團的蘇聯外交官科維仁科 (B. B. Ковыженко) 在 1991 年接受採訪時說，「九月全會」的決議草案是米高揚和波諾馬廖夫起草的，米高揚最初似乎要在平壤再一次扮演他曾在布達佩斯擔任過的角色。由於中國人 (彭德懷) 堅持要求金日成辭職，在最初的文稿中表示了要金讓位的意見。只是在科維仁科的反覆勸說後，蘇聯代表團才放棄了這一想法。因為蘇聯代表團的態度變得消極，中國人也放棄了這個主張<sup>㉒</sup>。對照上述檔案文件，這則回憶史料顯然是不可靠：既不是蘇聯人起草決議草案，彭德懷也根本沒有提出過要金日成辭職。可以認同的只有一點，即通過這次訪問，米高揚好像確實改變了對金日成的印象。

9月23日回到北京後，毛澤東在晚上接見了蘇聯代表團。在會談中，毛對這次訪問的結果似乎並不滿意，而米高揚則處處為金日成辯解。毛首先對決議中「上述同志犯下了嚴重錯誤」一句提出疑問，米高揚解釋說，因為這些人曾在「八月全會」提出撤銷黨的領導人。毛認為，對朝鮮黨批評得還不夠，沒有涉及政治方面，也沒有談發動戰爭的問題。米高揚推脫說，現在同他們談太多，他們聽不進去。毛又說，金日成發動戰爭是犯了大錯，自己還不承認。米高揚說，斯大林也應該負責任，金畢竟年輕，沒有經驗。毛說，金是你們捧上來的，就像一棵小樹，你們把它栽下去，美國人把它拔起來，我們又把它栽回原來的地方，現在卻神氣十足。米高揚說，現在已經有了進步，這次起草的決議看來是用腦子了。總之，米高揚感到心滿意足，說「我們的計劃是完成了」。毛卻不以為然，他意味深長地說：「問題並沒有結束，而是剛剛開始。」<sup>㉓</sup>問題的確還遠未結束，但中蘇對於處理朝鮮問題的態度和立場卻開始出現了分歧。

### 三 毛澤東把金日成比作東方納吉

米高揚回國匯報以後，1956年9月25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做出決議，對蘇聯代表團在與勞動黨中央及中共中央進行談判中的活動表示讚賞<sup>④</sup>。在蘇聯領導人看來，朝鮮的事情似乎已經解決了。其實在朝鮮，即使是表面的平靜也僅僅維持了很短一段時間。在金日成看來，由於蘇聯黨和中國黨的干涉，勞動黨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就做出了兩個自相矛盾的決議，這簡直就是奇恥大辱，也是對他剛剛提出的「主體」思想的絕大諷刺<sup>⑤</sup>。金對這種狀況是絕對不會接受的，他一方面拖延落實蘇中代表團的建議及其承諾，另一方面暗中抵制新的決議，等待時機反攻倒算。

蘇中代表團離開平壤以後，中國一直關注着勞動黨公布「九月全會」決議的問題。9月26日，彭德懷委託師哲轉告波諾馬廖夫，朝鮮至今尚未發表全會決議，而此前蘇中代表團在平壤已就這個問題與勞動黨達成協議，如果明天仍不能見報，兩國代表團的領導人有必要再次去朝鮮以解決這一問題，為此，即便是再次召集中央全會甚至代表大會，也在所不惜。在交談中師哲還說，中共中央獲悉，在平壤期間，金日成曾對手下人講，「兩位老大哥」這次來朝鮮，「就是要干涉朝鮮勞動黨的內部事務」<sup>⑥</sup>。根據莫斯科的指示，伊萬諾夫大使在第二天拜訪了朴金喆，朴對此的答覆是，勞動黨中央認為，在報紙上發表這些決議並不合適，並建議把「八月全會」和「九月全會」的文件材料製成專門的小冊子，分發給各級黨組織進行討論。蘇聯外交官提醒說，勞動黨已經同米高揚和彭德懷達成協議，將在報紙上公布中央全會決議；公布決議對勞動黨有利，這樣可以讓兄弟國家各黨都了解勞動黨的工作狀況；況且，這也是一個「原則性問題」，其意義在於「履行金日成和米高揚、彭德懷同志達成的協議」。朴答應向勞動黨中央常委會報告這次會談的內容<sup>⑦</sup>。9月28日，中國駐朝鮮臨時代辦曹克強拜訪伊萬諾夫，告知中共中央聯絡部和國務院辦公廳最近每天都提醒使館，必須關注朝鮮報刊，並督促朝鮮同志公布「九月全會」決議。曹還說，彭德懷臨走時特意叮囑，關於公布協議的問題已經同金日成達成協議。蘇聯大使轉述了朴金喆對此問題的答覆後，曹通報說，他從北京收到特別指示，在公布決議的問題上要與蘇聯使館保持聯繫，如果需要，就採取相應的措施讓朝鮮朋友對這一問題做出解釋<sup>⑧</sup>。顯然，中共中央對此事非常重視，而且已經有些不耐煩了。

面對如此情況，勞動黨乾脆來了一個先斬後奏，沒有再與中蘇兩黨商議，就在9月29日的《勞動新聞》刊登了一則簡短的消息<sup>⑨</sup>：

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於1956年9月23日舉行了全體會議。全會重新審查了中央八月全會關於崔昌益、尹公欽、徐輝、李弼奎、朴昌玉等同志的紀律問題的決議。上述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是，九月中央全會從進一步加強黨內思想意志的統一，把黨所團結的全部力量集中到完成當前的革命任務中去的誠懇願望出發，儘管他們的錯誤嚴重，仍寬以對待他們，給他們以反省自己錯誤的機會，為了繼續堅持對他們的教育，使他們改正錯誤，走上正確的道路，決定恢復崔昌益、朴昌玉同志的中

央委員職務；恢復尹公欽、徐輝、李弼奎同志的黨組織生活。九月全會強調，各級黨組織要徹底執行中央八月全會通過的〈關於政府代表團訪問兄弟國家的工作總結和黨在目前的幾項任務〉的決議所提出的任務，特別是要堅持耐心地教育和說服犯錯誤的黨員，對於幫助他們改正錯誤給以極大的關心。

同一天，《勞動新聞》還發表了一篇社論〈解釋、說服和教育是我們黨的基本領導方法〉，其中多次提到「黨內民主」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sup>48</sup>。也在這一天，曹克強拜訪朴金喆，告知北京對長時間拖延公布決議的情況表示關切。這時朴說《勞動新聞》已經在頭版刊登了有關通報，至於「八月全會」關於組織問題的決議和「九月全會」決議，估計不會再登報了，因為勞動黨將發行單獨的小冊子，分送各級黨組織<sup>49</sup>。

更讓毛澤東不能容忍的是，最關心公布決議的是中共領導人，他們最早提出這個問題，後來又一直對此追問不休，但勞動黨卻偏偏撇開中共，事前不商量，事後不通報。《勞動新聞》的消息發表以後，朝鮮方面一直沒有向蘇聯和中國解釋。直到10月5日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A. A. Громыко)指示駐朝使館詢問此事，金日成才在10月8日會見伊萬諾夫。金首先解釋說，報紙上刊登有關消息時，他本人不在乎壞，公布的材料是中央常委會其他人準備的。金還說，他並沒有就全文公布這些決議的文本與米高揚和彭德懷達成專門的協議，而只是答應可以考慮這個問題。後來常委會研究時認為，不能全文公布決議，因為其中講到「八月全會」錯誤決定的內容如果透露出去，會被南朝鮮過份渲染。另外，對於報紙上沒有刊登蘇中代表團建議的決議內容，即號召全黨遵守列寧主義關於黨內生活的原則和準則，金解釋說，刪除這個內容，是為了避免給黨員留下兄弟黨干涉朝鮮內部事務的印象，好像勞動黨重新審查「八月全會」決議是受到了外部的壓力，這樣會被敵人利用。金表示，決議已經印成小冊子在黨內傳達，勞動黨中央將會組織貫徹「九月全會」的決議。不過，金還有意透露：在基層組織討論時，黨員都紛紛譴責黨內派別活動，要求對他們進行更加嚴厲的處罰。伊萬諾夫最後問道，那些逃往中國的幹部是否知道與他們直接相關的「九月全會」決議，金冷冷地回答說，中央與他們沒有聯繫，也不知他們住在哪裏。又說，中國同志可以把這個消息告訴他們<sup>50</sup>。金不願履行承諾公布決議，主要是擔心他的「主體」形象受損，而只在黨內傳達，就可以任由他做出解釋了<sup>51</sup>。金出爾反爾，特別是迴避直接與中共聯繫的做法，令莫斯科無可奈何。蘇共中央聯絡部副部長維諾格拉多夫(И. Виноградов)在報告中認為，金這樣做，「實際上是拒絕了關於全文公布朝鮮勞動黨中央全會決議的建議」。面對既成事實，蘇共中央只得讓蘇聯大使出面，向中國使館轉告金的答覆。為了避免中方感到尷尬，蘇共中央聯絡部在電報中特意提醒蘇聯使館，「不要提此舉是受莫斯科的委託」<sup>52</sup>。

根據目前看到的檔案，中共中央是在《勞動新聞》發布消息後近一個月才得到朝鮮方面對此問題的解釋，而且是從蘇聯人那裏聽說的。10月26日，伊萬諾夫拜訪中國大使館，向曹克強詳細通報了金日成10月8日關於公布勞動黨中央全會決議問題的解釋。曹沒有提出任何問題，也沒有做任何反應<sup>53</sup>。

顯然，這種沉默就表示了中國的不滿。更讓中共感到不滿的是，勞動黨對其他有關承諾也找各種藉口拖延不辦。

關於崔昌益和朴昌玉，雖然根據新的決議恢復了他們中央委員的職務，但並沒有安排相應的工作。直到11月中旬，朴昌玉才從原來下放的木材加工廠調任正在建設中的馬洞水泥廠總指揮，按照金日成的說法，給他一年的時間來表現自己。崔昌益則被任命了一個閒職——物質文化及歷史文物保護局局長，但他拒絕了這一職務，並請求讓他作為院士從事科學研究工作<sup>⑳</sup>。關於尹公欽、徐輝、李弼奎和金剛，金昌滿在9月28日就通知中國使館，「朝鮮已經不需要他們了」。實際上，根據金日成有意向蘇聯使館透露的消息，已經開始調查他們的歷史問題，為將來羅織罪名而收集證據，甚至在「九月全會」發表批評意見的朴勛一也被列為調查對象。至於他們的家屬，在「八月全會」以後便被趕出了原來的住所，並斷絕了正常的口糧供應，至少到10月26日伊萬諾夫拜訪中國大使館時還沒有恢復。金剛的夫人曾去文化省請求幫助，被總務處長罵了出來。尹公欽等人得知「九月全會」的情況後，仍拒絕回到朝鮮，只是希望朝鮮政府允許他們的家屬來到中國<sup>㉑</sup>。11月19日，南日告訴蘇聯大使，朝鮮政府不反對讓他們的家屬也去中國<sup>㉒</sup>。實際上這一承諾並未實現，逃亡中國的朝鮮幹部從未與他們的家人見過面，也沒有得到過任何音信<sup>㉓</sup>。中國領導人最關心的是朴一禹，彭德懷曾親口對金日成講，希望朝鮮政府釋放朴一禹，並允許他來中國<sup>㉔</sup>。儘管金答應了彭的請求，勞動黨中央常委會也在10月的會議上做出決定，同意釋放朴，將其軟禁在家中或遣送中國，但實際上由於後來形勢的變化，這一決定始終沒有執行<sup>㉕</sup>。

金日成的拖延策略很快就取得了效果，歷史再一次給他創造了機會。10月中下旬，波蘭和匈牙利接連發生危機，赫魯曉夫請毛澤東幫助處理東歐兄弟黨的問題，中蘇兩黨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到了歐洲<sup>㉖</sup>。金沒有放過這個天賜良機，立即開始「清理門戶」。「九月全會」結束後，金選擇朴金喆負責黨內學習和傳達決議的工作，並處理遺留問題<sup>㉗</sup>。朴是黨內反對派最主要的攻擊對象，由他來負責這項工作，其目的和結果就非常清楚了。據平壤市委組織部部長金忠植的說法，「九月全會」以後，金日成的態度有些改變，勞動黨確實做了一些工作，給受到組織處理的幹部平反。但是「波匈事件」爆發後，金的態度「急轉直下」，又開始大力批判宗派主義，並要求堅決鎮壓反革命份子。金忠植本人是在朝鮮土生土長的幹部，也因對金日成不滿而受到牽連，被下放到一個工廠當廠長。就是在這樣的壓力下，他塗改出差證明信，僥倖擺脫安全部門的監視，逃到中國<sup>㉘</sup>。朴金喆工作的重點之一是整頓金日成大學——這個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被看作是「持不同政見者」和「政治自由思想」的溫牀，也是崔昌益的「大本營」。在學習和討論「九月全會」決議後不久，工作開始轉向思想鬥爭，校長俞成勛、歷史系主任金正道及一批教員受到了批判或整肅<sup>㉙</sup>。平壤市委、建設省、貿易省、職業聯盟的許多領導幹部都被解除了職務。平壤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因發言呼籲黨內民主而被開除出黨，副委員長洪淳寬則因不願「改正錯誤」而被再次開除出黨。李松雲在一次會議發言中說，米高揚和彭德懷到平壤就是來給勞動黨挑毛病的，金昌滿則針對反對派的活動惡狠狠地說，讓他們去折騰吧，我們手裏有內務省和軍隊<sup>㉚</sup>。在這

種緊張的氣氛中，又有大批幹部開始逃亡。除已被撤銷職務的李相朝拒絕回國外，逃亡中國的司局級以上幹部就有十六七人之多，繼尹公欽等人之後，還有洪淳寬(改名洪全)、金日成大學黨委員長洪洛雄(改名洪光)、人民軍總醫院黨委員長金正龍(改名楊一平)、駐蘇使館黨委員長李熙尚、職業聯盟黨委員長金志紅(改名韓京)、金忠植等<sup>⑤</sup>。與此同時，正在蘇聯學習的勞動黨中央委員金承化在平壤的家人也遭到迫害，以至他不得不請求蘇聯政府出面把他的三個孩子接到莫斯科來上學<sup>⑥</sup>。就連一直被視為中間派的朴義琬也感到「黨內氣氛緊張」，並向蘇聯使館抱怨說，金日成表面上接受了蘇中代表團的建議，但在他們走後「繼續犯錯誤」，許多具有不同意見的幹部被撤換、調離，甚至開除出黨。在這種情況下，他本人要求恢復蘇聯國籍、黨籍，並返回蘇聯<sup>⑦</sup>。

最令中共無法接受的是，就在匈牙利危機的高潮時刻，朝鮮政府提出參加聯合國大會(聯大)，以解決朝鮮統一及停戰等問題。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沒有解決朝鮮問題，在隨後與聯合國軍的停戰談判中，一直由中國代表實際負責軍事停戰委員會的工作。考慮到朝鮮停戰談判有長期化的趨勢，為維護朝鮮主權，11月24日，中國主動提出將今後的談判工作交由朝鮮方面負責，並在徵得朝方同意後，於12月6日下發了關於調整軍事停戰委員會朝中代表團工作關係的方案，將「軍事停戰委員會的一切事務，統由朝鮮人民軍代表團主持辦理，歸平壤直接領導」，並縮減了志願軍代表團工作機構的人員；但也規定，如遇重大問題，由平壤與北京協商解決<sup>⑧</sup>。1955年11月29日，第十屆聯大做出決議，要求繼續按照聯合國的目標在第十一屆聯大討論朝鮮問題。1956年4月9日，中國政府受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委託，呼籲召開有關國家會議，解決朝鮮問題。5月8日，聯合國軍方面通過英國政府發表聲明，拒絕參加會議，理由是朝中方面必須接受以「聯合國目標」為先決條件<sup>⑨</sup>。鑒於「1956年美國和李承晚集團企圖加緊取消中立國委員會和朝鮮停戰協議」，為了穩定朝鮮局勢，粉碎美國的陰謀，中國政府再次擔負起制訂一系列方針和措施的責任。但據蘇聯駐華使館的觀察，此時中朝政府之間在一系列外交問題上缺乏完全一致的看法，中國對此已感到不滿<sup>⑩</sup>。

勞動黨「八月全會」以後，中朝關係日益緊張，金日成顯然不會再讓中共來主導朝鮮問題的解決。就在「匈牙利事件」爆發的當天，1956年10月23日，南日突然向蘇聯使館提出，勞動黨中央常委會將討論外務省提出的建議，即朝鮮將派代表參加第十一屆聯大，並提出關於解決朝鮮問題的新建議<sup>⑪</sup>。這一設想事前並未向中國通報，更沒有進行協商。11月5日，也就是蘇聯在劉少奇的建議下再次出兵佔領布達佩斯的第二天，朝鮮政府把一份關於參加聯大的備忘錄交給蘇聯和中國政府。中國政府在回覆中對這一做法提出了質疑，認為聯合國是朝鮮戰爭交戰的一方，因此不會做出有利於朝鮮和中國的決議。但朝鮮方面堅持認為，聯合國成員國只有十四個參與了戰爭，而那些沒有參戰的國家可能會支持朝鮮的建議。在提出了一些「針對性措施」後，中國政府還是同意了朝鮮在備忘錄中的立場<sup>⑫</sup>。金日成選擇提出備忘錄的時機很重要，因為蘇聯和中國都在為如何化解東歐危機絞盡腦汁，哪有閒暇仔細考

慮朝鮮問題？儘管如此，中國還是以另一種方式表示了不滿。11月16日，周恩來召見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大使，通報了中國的經濟狀況，其中說到，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結束前，中國將不向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提供任何新的援助。這話實際上是針對朝鮮說的，因為8月21日金日成曾向中國大使喬曉光提出，請求中國在1957年度再向朝鮮提供新的援助。隨後在確定1957年貿易計劃時，朝鮮提出的援助金額為1.85億元，其中5,000萬元為新的無償援助，而中國政府對此遲遲沒有答覆。本來朝鮮政府已經準備派遣副首相金一訪華，簽訂1957年的貿易協定，聽到北京傳回的消息後，朝鮮不得不取消金一的中國之行，並決定重新審核1957年的經濟計劃，減少建設資金的投入<sup>①</sup>。

的確，在中共領導人看來，金日成提出尋求聯合國協助的問題非同小可。這種做法不僅是要擺脫中國在處理朝鮮問題上的影響，更嚴重的是這種求助於聯合國的外交舉動，與匈牙利的納吉(Imre Nagy)政府宣布中立、向聯合國呼籲援助的行為如出一轍。所以，匈牙利危機剛剛過去，毛澤東就回過頭來着手處理朝鮮問題了。11月28日，毛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門討論了朝鮮問題<sup>②</sup>。儘管會議的內容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兩天後毛與蘇聯大使尤金(П. Ф. Юдин)的長篇談話無疑反映了中共中央對處理朝鮮問題及中朝關係的基本態度和立場。

11月30日晚11時，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接見了尤金。談話一開始，毛就提出，匈牙利的局勢已經好些了，現在東方又出了問題，是否會發展成為類似匈牙利的事件，還要看情況。這就是朝鮮的問題。最近，朝鮮想請聯合國出面勸告交戰雙方和平解決朝鮮半島的問題，一方是以美國為首的十六個國家，另一方是金日成。毛說：「我們算甚麼呢？我們中國只有半方，交戰中非正式的一部分。」顯然，毛對金拋開中國而直接與聯合國拉關係表示了強烈不滿。接着，毛問道，聯合國是參戰的一方，聯合國軍方面又發表聲明要求南北雙方在聯合國的監督下舉行自由選舉，結果會如何呢？尤金表示，他已經把張聞天轉達的中方意見打電話告訴了赫魯曉夫。他個人認為，朝鮮的做法違背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並相信蘇聯政府也會同意中國政府的看法。毛直言不諱地指出，朝鮮提出這個問題很奇怪，他們的思想很危險，「金日成可能會變成納吉」。在金看來，「我們〔中國〕的菩薩不靈了，另外一個菩薩靈了，這就是聯合國」。朝鮮的局勢很不穩定，內部鬥爭很激烈。不久前米高揚和彭德懷去平壤提出友好的勸告，金認為是干涉他，現在他在朝鮮實行內部整肅，還想請聯合國幫助。談到朝鮮問題的出路，毛說，「朝鮮國內的政治狀態似乎無法改善。國內沒有一個哥穆爾卡可以代替金日成，他們國內所有的哥穆爾卡都被殺掉了，而金日成本人既不是哥穆爾卡、羅科索夫斯基，又不是卡達爾，他近似納吉」。朝鮮面臨着三條可能的道路：哥穆爾卡(Wladyslaw Gomulka)和卡達爾(János Kádár)的道路，鐵托(Josip B. Tito)的道路，或納吉的道路<sup>③</sup>。帝國主義就是希望社會主義國家脫離社會主義陣營，「納吉沒有變成，而金日成可能會變成〔指脫離社會主義陣營〕」。如果這樣，金就會要求中國軍隊撤出朝鮮。蘇聯軍隊因有華沙條約可以留在波蘭，而我們是志願軍，金又不喜歡，他要送客怎麼辦？「不走吧，沒有理由留下；走吧，朝鮮會脫離社會主義陣營，走向西方或者變成鐵托」。話說到這裏，毛提出，希望與蘇聯

商量幫助朝鮮走第一條道路的可能性。這時尤金表示，他也對朝鮮的局勢非常擔心，並說朝鮮有意在中蘇之間挑撥離間，而且採取兩面派的手法，說一套，做一套。毛說，既然朝鮮對蘇聯的態度較好，那就請蘇聯同志多做一些工作。至於中國，早就感到中朝關係存在問題，金認為是中國唆使那些從中國回去的幹部反對他，現在他把這些幹部都清除了，覺得地位穩固了，中國也無法干涉他了。「現在我們有兩種意見：第一，撤回志願軍，讓朝鮮同志願意怎樣搞就怎樣搞；第二，不撤志願軍，採取積極措施來挽救形勢，同金日成進行會談，改善相互關係」。最後，毛要求尤金把中國的看法立即報告赫魯曉夫和蘇共中央，請他們提出意見。毛還說，只要中蘇兩國聯合在一起，沒有甚麼解決不了的問題<sup>⑭</sup>。

仔細揣摩毛澤東的談話並考察這一階段的中朝關係，筆者傾向於認為，儘管毛最後提出了解決朝鮮問題的兩種辦法，但實際上他的整個談話已經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中國解決朝鮮問題的目的堅定而明確：第一，朝鮮必須留在社會主義陣營；第二，中朝必須恢復正常關係。而毛對朝鮮現狀的判斷是，金日成很可能成為東方的納吉，試圖脫離社會主義陣營，投靠聯合國；金根本不信任中國，自從清除黨內的「延安派」幹部後，中朝關係已陷入僵局。在這個前提下，毛說讓朝鮮人「願意怎樣搞就怎樣搞」，顯然是針對朝鮮要中國撤軍而說的一種氣話，實際上中國是不願做出這種選擇的<sup>⑮</sup>。所以，剩下的辦法只有一種，那就是依仗在朝鮮的幾十萬志願軍，迫使金改變方針，接受中蘇兩黨的領導，留在社會主義陣營；否則，就只能更換朝鮮領導人。這就是毛所說的第一條道路和「積極措施」，即哥穆爾卡和卡達爾的道路。因此可以這樣判斷，中共向蘇共提出的解決朝鮮問題的建議，主導想法是採取極端手段，理由是金要脫離社會主義陣營，而實際目的是改善中朝關係，讓朝鮮服從中共的路線。

與蘇聯大使的會談結束後，毛澤東不等待莫斯科的答覆，便向朝鮮表明了自己的強硬立場。12月8日，中國政府向朝鮮政府發出了備忘錄。與上一次對朝鮮備忘錄的答覆完全不同，這個備忘錄嚴厲指出，無論在事實上還是法律上，聯合國都是朝鮮戰爭的交戰方，而且長期被美國操縱，干涉朝鮮事務，因此不能接受朝鮮政府有關聯合國參與調解朝鮮問題的建議<sup>⑯</sup>。12月16日，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奉命拜會陳雲代總理，通知說，莫斯科對毛澤東與尤金談話中所提的朝鮮問題「異常關注」，蘇聯政府同意中國政府的意見，即「目前由朝鮮提請聯合國協助解決朝鮮統一問題是不適宜的，並且準備指示蘇聯駐平壤大使向朝鮮政府就這個問題作出相應的勸告」。對於談話中提出的其他問題，蘇聯政府建議等周恩來到莫斯科後面談<sup>⑰</sup>。

從當時中朝關係和蘇朝關係的狀況看，朝鮮的確更接近蘇聯，甚至企圖依靠蘇聯來抵制中國的影響。所以，毛澤東要解決朝鮮問題，改善中朝關係，必須也只能得到蘇聯的幫助。看起來，毛對赫魯曉夫是抱有信心的，中共剛剛協助蘇共處理了波蘭和匈牙利問題，作為回報，蘇聯也應該幫助中共解決朝鮮問題。可惜，毛想錯了。在1956年這個「多事之秋」，局勢多變，中蘇聯手尚且無法迫使金日成就範。到1957年，不但蘇聯對朝鮮的看法發生轉變，中蘇之間也出現了嫌隙，毛想用解決匈牙利問題的方式處理朝鮮問題，自然

無法如願以償。不過，毛的主要目的並非對付金日成，而是要讓朝鮮緊緊靠攏中國。既然強硬措施不能奏效，還有懷柔的做法，而要取信於金，最後的一招就是把中國人民志願軍全部撤離朝鮮。

## 註釋

- ① 中共八大文件，參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蘇共二十大主要文件，參見《人民日報》，1956年2月16至21、25日各版。
- ②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4月5日，第1版。
- ③ 由於版面限制，「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按時間順序分為五個專題六篇文章：「在黨內排除異己」、「八月事件」（上、下）、「應對中蘇共同干預」、「毛澤東轉變對朝方針」、「志願軍撤離北朝鮮」。前三篇已經刊出，參見沈志華：〈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在黨內排除異己〉、〈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八月事件」序曲〉、〈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八月事件」正劇〉，《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5年10月號、12月號，2016年2月號，頁68-85、84-96、71-81，其餘各篇將在《二十一世紀》陸續刊出。
- ④⑧ 黃長燁：《我所看見的歷史真理——黃長燁回憶錄》（首爾：宇宙出版社，1999），頁111-12。
- ⑤ 〈關於崔昌益、尹公欽、徐輝、李弼奎、朴昌玉等的宗派陰謀〉，《勞動新聞》，1956年9月5日，第1、2版。
- ⑥ 〈為了落實八月全會決議（平壤市積極份子會議）〉，《勞動新聞》，1956年9月15日，第2版。
- ⑦ 伊萬諾夫（В. И. Иванов）給米高揚（А. И. Микоян）等人的報告，1956年9月15日，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ф.5446，оп.98，д.721，л.153-55；舍斯特里科夫（Н. М. Шестериков）日記，1956年9月14、18日，РГАНИ（俄羅斯國家當代史檔案館），ф.5，оп.28，д.412，л.302-303，304-306。
- ⑨ 筆者採訪金剛記錄，太原，2010年2月16日。
- ⑩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9月4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0，л.322-25。
- ⑪ 庫爾久科夫（И. Ф. Курдюков）致波諾馬廖夫（Б. Н. Пономарев）函，1955年4月7日，РГАНИ，ф.5，оп.28，д.314，л.48-50。
- ⑫ 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三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9），頁402-405。
- ⑬ 姜鋒等：《楊勇將軍傳》（北京：解放出版社，1991），頁328-31；李志民：《李志民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頁690。
- ⑭ 國務院對於朝鮮、越南經濟技術援助工作檢查報告的指示，1956年1月20日，河北省檔案館，694-7-188，頁1-23；湖北省檔案館，SZ34-003-0244，頁1-23。
- ⑮ 徐輝等人給中共中央的信，1956年9月5日，ГАРФ（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ф.5446，оп.98，д.721，л.161-81。從後面的情況看，該文件應該是當時中共交給蘇共的，這充分證明中蘇之間的溝通非常及時。
- ⑯ 李相朝給赫魯曉夫（Н. С. Хрущев）的信，1956年9月3日，ГАРФ，ф.5446，оп.98，д.721，л.159-60。
- ⑰ 費德林（Н. Т. Федоренко）與李相朝談話紀要，1956年9月5日，ГАРФ，ф.5446，оп.98，д.721，л.156-58。
- ⑱ 蘇共中央主席團決議，1956年9月6日，РГАНИ，ф.3，оп.14，д.56，л.3。
- ⑲ 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記錄，1956年9月6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5，л.30。
- ⑳ 波諾馬廖夫與李相朝談話紀要，1956年9月10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0，л.228-32。
- ㉑ 米高揚致蘇共中央電，1956年9月16日，ГАРФ，ф.5446，оп.98с，д.717，л.2-4。

- ⑳ 蘇共中央主席團決議，1956年9月15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1。
- ㉑ 米高揚與朝鮮代表團會談記錄，1956年9月16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с, д.718, л.48-57。
- ㉒ 米高揚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6年9月17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с, д.718, л.47。
- ㉓㉔ 米高揚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6年9月19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с, д.718, л.35-38。
- ㉕ 毛澤東接見蘇共中央代表團談話記錄，1956年9月18日，未刊。
- ㉖ 毛澤東接見朝鮮代表團談話記錄，1956年9月18日，未刊。
- ㉗㉘㉙ Andrei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The Failure of De-Stalinization, 1956*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138; 140-41; 140-42.
- ㉚㉛ 米高揚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6年9月21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с, д.718, л.12-16。
- ㉜ 朝鮮勞動黨中央常委會議紀要，1956年9月20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с, д.718, л.17-34。
- ㉝ 米高揚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6年9月22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с, д.718, л.9-11；代表團與金日成等人會談紀要，1956年9月22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27-30。
- ㉞ 米高揚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6年9月23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с, д.718, л.3-6。
- ㉟ 朝鮮勞動黨中央全體會議紀要，1956年9月23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31-43。
- ㊱ 朝鮮勞動黨中央全體會議決議，1956年9月23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44-45。
- ㊲ 毛澤東接見蘇共中央代表團談話記錄，1956年9月23日，未刊。
- ㊳ 蘇共中央主席團第П42/1號決議，1956年9月25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1。
- ㊴ 關於金日成的「主體」思想，參見沈志華：〈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在黨內排除異己〉，頁68-85。
- ㊵ 波諾馬廖夫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6年9月26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с, д.718, л.2。
- ㊶ 伊萬諾夫與朴金喆談話紀要，1956年9月27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86, л.20-23。
- ㊷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9月28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86, л.23-26。
- ㊸㊹ 兩篇社論參見《勞動新聞》，1956年9月29日，第1版。
- ㊺ 伊萬諾夫與曹克強談話紀要，1956年10月1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86, л.26。
- ㊻ 伊萬諾夫與金日成談話紀要，1956年10月8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86, л.28-33。
- ㊼ 據朴金喆和李松雲向蘇聯使館的報告，「九月全會」的消息傳出，的確使許多勞動黨員感到困惑。參見佩利申科(В. И. Пелишенко)與朴金喆談話紀要，1956年11月22日、薩姆索諾夫(Г. Е. Самсонов)與李松雲談話紀要，1956年11月23日，轉引自Andrei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143-44。
- ㊽ 維諾格拉多夫(И. Виноградов)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6年10月15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296-97。
- ㊾㊿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10月26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2, л.344-47。
- ㊰㊱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11月19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1, л.293-395。
- ㊲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9月28日、10月26日、11月5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86, л.23-26；д.412, л.344-47；д.412, л.366-70；伊萬諾夫與金日成談話紀要，1956年10月8日。
- ㊳ 筆者採訪金剛、金忠植記錄，太原，2010年2月16、17日。
- ㊴ 伊萬諾夫給謝皮洛夫(Д. Т. Шепилов)的報告，1956年12月28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86, л.1-17。

- ⑤⑧ 關於「波匈事件」以及中共協助蘇共消除危機的過程，詳見沈志華：〈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機：中國的角色和影響——「波匈事件與中國」研究之一〉，《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頁119-43。
- ⑤⑨ 毛澤東會見金日成談話記錄，1960年5月21日，未刊。
- ⑥⑩ 筆者採訪金忠植記錄，太原，2010年2月17日。
- ⑥⑪ 北韓年鑒刊行委員會編：《北韓總鑒(1945-1968)》(首爾：共產圈問題研究所，1968)，頁178；Andrei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148-49。
- ⑥⑫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10月26日；伊萬諾夫給謝皮洛夫的報告，1956年12月28日。
- ⑥⑬ 筆者採訪金剛、金忠植記錄；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11月14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2, л.373-74。毛澤東與米高揚談話中提到的數字是十五人，參見毛澤東接見蘇共中央代表團談話記錄，1956年9月23日，未刊。
- ⑥⑭ 李相朝致波諾馬廖夫函，1956年11月14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2, л.379-82。
- ⑥⑮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11月22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1, л.295-96。
- ⑥⑯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頁251；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三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頁474。
- ⑥⑰ 〈十屆聯大關於朝鮮問題的決議〉(1955年11月29日)、〈我外交部關於聯合國軍方面拒絕召開有關國家會議協商從朝鮮撤出一切外國軍隊和和平統一朝鮮等問題的聲明〉(1956年6月1日)，載世界知識出版社編：《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二輯，下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頁2312-13、2362-67。
- ⑥⑱ 蘇聯駐中國大使館1956年工作報告，1957年4月18日，АВПРФ, ф.5, оп.28, п.103, д.409, л.139-40。
- ⑥⑲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10月23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2, л.341-42。
- ⑦⑰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11月28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1, л.301-302；蘇聯駐中國大使館1956年工作報告，1957年4月18日，АВПРФ, ф.5, оп.28, п.103, д.409, л.139-41。
- ⑦⑱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639；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9月4日、11月28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22-325; д.411, л.301-302；伊萬諾夫給謝皮洛夫的報告，1956年12月28日。
- ⑦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頁133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351。
- ⑦⑳ 按照毛澤東當時的理解，哥穆爾卡和卡達爾的道路指反對蘇聯，但不反共，留在社會主義陣營；鐵托的道路指反對蘇聯、離開社會主義陣營，但不反共；納吉的道路指反蘇、反共、投靠西方。
- ⑦㉑ 毛澤東接見尤金(П. Ф. Юдин)談話記錄，1956年11月30日，未刊。
- ⑦㉒ 毛澤東說金日成要「送客」的感覺是不錯的，儘管沒有直接提出這方面的要求，但金確有此想法。1957年6月4日，南日在與蘇聯大使會談時就暗示，是否可以在聯合國大會提出讓中國單方面撤軍的建議。當蘇聯駐朝鮮大使普扎諾夫(А. М. Пузанов)斷然否定了這一設想後，南日立即說，他的意思是說撤出的部分軍隊可以部署在中朝邊境，並解釋說這只是他個人的想法。參見普扎諾夫與南日會談紀要，1957年6月4日，АВПРФ, ф.0102, оп.13, д.5, л.116-17。
- ⑦㉓ 蘇聯駐中國大使館1956年工作報告，1957年4月18日，АВПРФ, ф.5, оп.28, п.103, д.409, л.141-42。
- ⑦㉔ 陳雲接見蘇聯臨時代辦談話記錄，1956年12月16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0743-10，頁52-54。